



# 蒋飞：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初探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蒋飞等

## 核心观点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屡遭波折，俄乌冲突持续及外溢影响不断扩大，多个经济体通胀压力持续升高，新冠疫情仍在反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1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2023年将出现大范围增长放缓。

经济增长理论与各国发展经验都表明，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与技术水平不断接近世界前沿，其经济增速会趋缓。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换挡期，2012—2021年中国GDP增速均值为6.7%，明显低于1978—2011年10%的平均水平。其中2020年、2021年GDP平均增速为5.2%，2022年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为3%。

我们在本文尝试测算了我国2022-203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中性情形下，2021—2025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5.5%左右，2026-2030年潜在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潜在增长率只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实际经济增速围绕经济潜在增速上下波动。一方面，潜在增长率的实现取决于经济中各类主体在政策激励下的行为决策。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一些条件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随之改变。因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反映和结果，要认识到通过恰当的改革开放创新举措来理顺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从年初就反复提到《破旧立新，储粮过冬》，所谓的“破旧立新”就是改革。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着从粗放到精细，从债务推动到技术推动的重大转变。这就势必要求 TFP 增速维持较高水平。反观过去几年我国 TFP 一直处于相对较低速度。中国当前人均 GDP 和 TFP 增速大约处于德国 37 年前的水平，我们认为德国是中国发展的榜样之一，应该通过加速改革，促使国内 TFP 增速向德国等发达国家靠拢。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 GDP 较高增长可能不会是常态。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过程，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关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要素优化配置；从关注 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我们要的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并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

风险提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潜在经济增速测算可能存在误差；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存在较多假设变量，假设变量可能与实际数值不符的风险；降息降准不及预期；财政政策超预期；新冠疫情再次爆发。



## 1. 引言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屡遭波折，俄乌冲突持续及外溢影响不断扩大，多个经济体通胀压力持续升高，新冠疫情仍在反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1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2023年将出现大范围增长放缓。

经济增长理论与各国发展经验都表明，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与技术水平不断接近世界前沿，其经济增速会趋缓。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换挡期，2012—2021年中国GDP增速均值为6.7%，明显低于1978—2011年10%的平均水平。其中2020年、2021年GDP平均增速为5.2%，2022年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为3%。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四五”初期的两年，受多方面外部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来看并不理想，那么测算未来潜在经济增速越发凸显出重要性。

如冯明等在《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研究：进展、共识和分歧》中提到的，从短期来看，潜在增长率水平直接影响到对产出缺口和宏观经济景气冷热度的判断，进而影响着财政货币等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定调和力度把握。更重要的是，从中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关系到对“十四五”规划、第二个“百年目标”等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研判部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城市结构与乡村治理、交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生育政策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统筹制定。因此下文我们尝试对中国 2022-2030 年潜在经济增速进行预测。

## 2. 模型构建与估算步骤

我们利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算和预测。生产函数形式如公式 (1) 所示， $Y_t$  为  $t$  时期地区生产总值， $K_t$  为  $t$  时期的资本存量， $L_t$  为  $t$  时期的劳动力投入， $A$  代表了技术水平，即全要素生产率。 $\alpha$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 $\beta$  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1)

$$Y_t = AK_t^\alpha L_t^\beta \quad (1)$$

公式 (1) 两边取对数可得公式 (2),

(2)

$$\ln(Y_t) = \ln(A) + \alpha \ln(K_t) + \beta \ln(L_t) \quad (2)$$

通常假设  $\alpha + \beta = 1$ , 即规模收益不变, 则有

(3)

$$\ln(Y_t) = \ln(A) + \alpha \ln(K_t) + (1 - \alpha) \ln(L_t)$$

$$\text{或者 } \ln\left(\frac{Y_t}{L_t}\right) = \ln(A) + \alpha \ln\left(\frac{K_t}{L_t}\right) \quad (3)$$

具体潜在经济增速的估算步骤如下:

首先, 利用生产函数方程进行回归估计, 得出  $\alpha$ 、 $\beta$  (即  $1 - \alpha$ ) 的参数值, 也就是资本、劳动产出弹性。然后利用 GDP 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劳

动力投入增速及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公式（4）计算得出全要素增长率。

(4)

$$\frac{dA_t}{A_t} = \frac{dY_t}{Y_t} - \alpha \frac{dK_t}{K_t} - \beta \frac{dL_t}{L_t} Y_t \quad (4)$$

其次，使用 HP 滤波法计算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根据（2）式以及  $\alpha$  的估计值，计算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

再次，通过回归等方式估算出未来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判断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并利用  $\alpha$ 、 $\beta$  参数，计算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

### 3. 数据选择和处理

我们主要参考马晓玲、蒙卫华《“十四五”时期广东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以及刘希哲、陈彦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中的数据处理方法。选用 1978—2021 年为本模型的样本区间，样本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

产出 (Y) 代表实际 GDP，是以 1978 年为基期，选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不变价 GDP 数据，并由统计局公布的不变价 GDP 同比值倒推得到。

资本存量 (K) 代表资本投入，是以 1978 年为基期，通过永续盘存

法计算而来。参考张军、吴桂英等人（2004）关于计算资本投入的公式，即  $K_t = I_t / P_t + (1 - \delta_t) K_{t-1}$ ，其中， $K_t$  为  $t$  时期实际资本存量， $K_{t-1}$  为  $t-1$  期实际资本存量， $\delta_t$  为  $t$  期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P_t$  为  $t$  期的固定资本价格指数， $I_t$  为  $t$  期的名义投资。

关于名义投资  $I_t$ ，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率  $\delta_t$ ，孙辉、支大林和李宏瑾（2010）等人选取的折旧率为 6%；张军（2004）等人计算得到折旧率为 9.6%；刘哲希、陈彦斌（2020）对资本折旧率采取分段设定的方式，1978—1990 年设定资本折旧率为 5%，1991—2007 年设定为 6%，2008—2019 年设定为 7%。我们综合考虑，最终选取折旧率为 5%。

关于固定资本价格指数  $P_t$ ，1990 年之前的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测算得到所隐含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 年-2019 年的数据源于 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19-2021 年的数据由 PPI 生产资料回归测算。关于基期资本存量，参考张军等人（2004）的研究，将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264](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264)

